

围棋：黑白之间的古老智慧

□ 滕艳丽

围棋是起源于中国，流行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传播于全球的国际通行棋种，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发明的具有高度文化色彩且最复杂的智力博弈活动之一。

围棋的起源、发展与传播

在中国古代，围棋称为“弈”，是棋类之鼻祖，属于“琴棋书画”四大文化之一。围棋的棋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采纳这一说法，将围棋的起源确定为公元前2356年。

西汉，围棋在全国流行，围棋名手开始出现；东汉，围棋顺利发展，为士大夫所重视，出现系统的围棋理论。三国中期，围棋在魏、吴两国迅猛发展，曹氏家族与“建安七子”雄踞北方，吴国也是名手辈出，编纂出精彩的棋谱《吴图》。盛唐，官方积极推动围棋发展，设置“翰林棋待诏”，优秀棋手成为吃俸禄的文职人员。两宋延续盛唐传统，棋风极盛。到了元代，出现《玄玄棋经》，被后世奉为经典。明代，各派棋风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到了清代，围棋发展至鼎盛，大国手辈出。但是，随着清末国力衰落，中国围棋进入了半个多世纪的低谷期。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围棋缓慢复兴。改革开放则快速推动了围棋事业的发展，中国围棋地位迅速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以聂卫平、马晓春为代表的一批国手，全面推动中国围棋再度崛起，也开启了中日韩三足鼎立的时代。

人类进入21世纪，电子计算机以“穷举法”的运算优势横扫所有棋类运动，但对超过宇宙原子总和运算量的围棋却无计可施。然而，2016年3月，“阿尔法围棋”（AlphaGo）依靠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方法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这标志着围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围棋从中国出发，以不同的途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南北朝时期，围棋向朝鲜半岛传播，再传入日本。16世纪时，葡萄牙航海人员在日本学过围棋，并将它带到了欧洲。在欧洲人看来，围棋是高雅而又严肃的游戏。

围棋运动现已遍布世界各地，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最为兴盛，在西方各国也已相当流行。奥地



〔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

利、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均有围棋协会，其中美国规模最大，设有100多个分会。

围棋的战略思维

一盘棋局的开端是布局，布局是战略而非战术，它的好坏决定了整个棋局的走向，能充分体现出弈者的谋略水平和顶层思维。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围棋对布局的钻研与探索、对子力部署的协调、对阵型的配合与应用，都已发展至精深，高手可以达到开局即进入最高效率布局，每一步都为全局的战略意图服务。

围棋注重战略的顶层设计。围棋布局必须以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对各种要素进行合理化配置，这样才能优化己方的棋势，把握主动。这种情况下，顶层设计几乎贯穿整个棋局，把整体的战略与局部的战术统筹起来，把握好战略协同是取胜的关键。

围棋注重战略的关键节点。围棋的布局速度极快，掌握主动权至关重要。看似不疾不徐的开盘落子，但几招之内，往往形势已大变，攻守之势已形成。AI把握围棋的这一特点，抢先手往往寸步不让，甚至弃子争先。这与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异曲同工，是有效把握关键点，奠定全局胜利的基础。

围棋注重战略的全局观念。局部最优并非整体最优。围棋当中有很多定式，比如“宁失数子，不失一先”“流水不争先”等，都是重点强调全局观念。围棋的策略不局限于一时的成败或得失，而是瞄准最终的胜利。这意味着在棋局中，弈者必须从始至

终考虑全局，而不仅仅是单个棋子或部分棋子的生死。每一个棋子都是形成全局走势的关键。这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复杂问题时，需要以更大的视野协调各个方面，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而不仅仅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围棋注重战略的持久性。围棋秉持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在棋局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空间，逐渐消解对手的战略空间，以长线思维积小胜为大胜。在制定长远计划和战略时，需要分析对手的弱点，根据自己的棋艺与棋风找出自己的优势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和战略，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和变化，这当中体现了围棋战略的持久性，体现了以长远的规划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长远目标。因此，支撑围棋长期战略的是弈者开阔的心胸与视野，长期主义的思路，以及善于从长期态势、全局关联来分析判断的敏锐思维，还有把每一个应对之策都对准最终目标的研判思考能力。

围棋的文化精神

围棋源于中华上古时期，又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与中华文化中的礼仪与哲学完美融合为一体。围棋中的礼仪贯穿始终，全局每一次落子都是阳谋，光明正大。棋局结束时，胜者不骄不躁，败者心悦诚服，这是对弈双方的君子风范；棋局发展的过程中，战略形势始终在变化，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固定模式，在棋局不同位置、不同空间都存在差异，部分与整体都有关系，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策略都会随之产生变化。

围棋棋盘中央的星位称为“天

元”，借用了道家宇宙观中的太极含义。以天元为中心，棋盘形成九宫格结构，八个正方形围绕中心的正方形排列，当中的星位代表八卦，这是在《河图》宇宙观的基础上制成的。围棋的棋子则是由《河图》中的阴与阳演化而来，象征着宇宙中的此消彼长。在这一宇宙观的基础上，围棋的战术与战略纵横驰骋，又与艺术的境界、自然的美感相通。

在监督工作上充分融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各类监督充分倾听群众呼声心声、所思所想、所盼所愿，明确监督方向和着力点，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人民监督天然优势，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让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时刻感受到监督就在身边。将监督反馈情况纳入向社会公开内容，推动监督事项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及时回应群众呼声。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是一个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有机整体。通过整合监督力量、契合监督程序、融合监督工作，使“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有效形成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为跳出历史周期率，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等提供持续的原动力和驱动力，不断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

元”，借用了道家宇宙观中的太极含义。以天元为中心，棋盘形成九宫格结构，八个正方形围绕中心的正方形排列，当中的星位代表八卦，这是在《河图》宇宙观的基础上制成的。围棋的棋子则是由《河图》中的阴与阳演化而来，象征着宇宙中的此消彼长。在这一宇宙观的基础上，围棋的战术与战略纵横驰骋，又与艺术的境界、自然的美感相通。

围棋当中美的元素，蕴含着神秘的东方色彩与君子的雅致风范，历史上著名的大国手，不仅棋技出众，棋艺也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在中国传统社会，围棋被看成艺术与技艺的完美融合，日本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是围棋从一项游戏向高雅艺术转变的关键，中国古代的诗词印证了这一变迁的过程。从盛唐起，诗中有关对弈所处的场所、对人的描述逐渐增多，正所謂“功夫在棋外”。杜甫有“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的美句，白居易写过“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宋词当中对围棋的描写，都离不开故人相聚、唯美景致、物我两忘的境界，棋局当中的技法与形势，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棋局当中最能体现美感的，就是对弈当中蕴含的形态美学。棋子之间的排列与组合复杂多变，且蕴含诸多可玩味之处，给人以美的感受，就如罗素所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棋形”构成了围棋当中层出不穷的范式，在空间形态美学的表达上，可以阐释城市规划形态、美学排列布局、工业设计创意，为美学研究的应用提供更多的参考。

围棋的本源始终是蕴含着中华文明智慧的艺术与文化，它成为竞技体育项目且纳入国际赛事的历史并不久远。自盛唐以来，围棋一直是因其文化性而具备广泛影响力。然而，今天中国围棋对于竞技性的挖掘远远超出了对文化性的探索，人们对围棋的理解，正在从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降维”为体育竞技。这对围棋的传承与发展是不利的。未来，我们仍将持续探索围棋的传承与发展方向，在文化的维度深入挖掘，这是重估围棋内在价值，进一步推动围棋发展应把握的内在逻辑。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人称“包公”“包青天”。他自幼以孝闻名乡里，在地方上，曾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在中央，曾任监察御史、知谏院、三司使等，“强志尽瘁，夙夜匪懈”，最后在枢密副使职位上去世。

《包拯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前37字训辞、后14字押字，可谓字字珠玑，核心要义是告诫后世子孙要遵从其志，做官不得贪赃枉法，做人要清白廉洁，鲜明彰显了“廉为官之本，贪为政之蠹”的廉洁文化理念。

严以治贪

《包拯家训》训辞主要围绕“赃滥”展开，充分体现了包拯对贪赃枉法的痛恨。包拯惩治贪腐以严著称。朱熹说，包孝肃公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包拯在任职开封府期间，发现其辖区内的达官显贵沿惠民河修建了许多楼舍亭榭，导致河道变窄、河水不时泛滥，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对此他不畏权贵，下令将违法建筑悉数拆除。在任监察御史、知谏院等期间，包拯多次上疏严劾贪官酷吏，综观《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他先后上疏弹劾张若谷、王逵、张尧佐、张方平、郭承祐、宋庠、李淑、刘兼济、宋祁等人。他弹淮南转运使王逵“苛政暴敛，殊无畏惮”“非理配率人户钱物上供，以图进用”“害民蠹化”；弹三司使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弹雄州知州刘兼济“材庸识暗，素无廉节”；弹吏部侍郎宋祁“在益都多游宴”等，希望对这些毫无廉洁操守的贪官污吏予以降黜。

为促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包拯还提交了“乞不用赃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废陋赃吏”等眾多奏议，希望朝廷“精选廉干中正之人”为官从政，力图从选人用人上断绝赃滥者从政的幻想。包拯主张澄清吏治，选任贤才，裁抑特权，其上疏治贪之多、执法治贪之严，从当时京师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即可显现。

廉以用权

《包拯家训》训辞虽然主要围绕“赃滥”展开，但训示的本义在于告诫后世为官的子孙要“廉政亲民”。亲民之官，以廉为基。廉洁是一个官员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包拯重言教更重身教，自入仕伊始，他就一直倡导和躬行清正廉洁。包拯在《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一生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务求做到廉以用权、权为民用。

在泸州当知州时，包拯的亲戚非常高兴，想借着他的威风徇私枉法，其中就有他的舅舅，包拯对此毫不姑息。他亲自开庭审讯他的舅舅，并杖责数十大板，“自是亲旧皆屏息”，其亲朋好友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为非作歹了。在任职开封府之初，当时有所谓的牌司制度，即“凡诉讼者不得直入衙内，府吏守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为了防止门牌司收转状纸时向告状人索贿受贿，包拯上任即改革此项制度，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允许告状人直接上庭递交状纸，“自道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实现了官民“无复隔阂”。

《包拯家训》要求后世子孙如果做官，当廉以用权，若贪污违法而被撤职，则不允许回老家走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能葬于包家世代的坟塋之中。如此严厉的家训，是包拯人生道德准则的体现，反映了他高尚正直、廉洁奉公的操守，体现了惩恶扬善、公正廉明的清官形象。

洁心自律

《包拯家训》训辞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8字，既是对后世子孙为官者的要求，又是对子孙中非仕之人的垂诫。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包拯初任扬州天长县令时，就写成廉诗一首作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诗的首句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自始至终，他初心不改、洁身自好。

在出任端州之时，当时端州因出产名贵的砚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一定的数额。此前历任郡守常以进贡的名义向老百姓多敛取数十倍以馈赠权贵。包拯到任后，严令按进贡的定额

《包拯家训》中的廉洁文化理念

□ 王鹏程

征收，多一个也不行。包拯自己很喜欢书法，对文房用具也情有独钟，但他在此地期满卸任，“不持一砚归”。后人对此评价说：“此其律己之义，凛乎严凝，盖有肃于秋霜而寒于冬雪者。”

包拯一生多次拒绝他人送礼，在他60岁生日之际，仁宗皇帝也曾送其贺礼，并在纸上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拯看后，立即挥毫题诗回诏：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此诗可谓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生动写照。《宋史》记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为家国大事计，包拯修身正心、廉洁自律令后世敬仰。

化廉成风

《包拯家训》14押字，既是以石刻方式对后世子孙的严明要求，也反映了包拯冀望出现“风化日益美，贤杰日益耸”的盛世美景。好家风推动形成好民风好政风。包拯特别注重弘扬历史名臣的真善美事迹，强调应以他们为榜样，以此化风成俗。他因宋太宗时期礼部侍郎王明“节义端劲，功烈卓伟”而感动，特撰写王明曾孙王临所著《家传》，并上疏仁宗皇帝《请谥王明》。在他去世后，仁宗皇帝也因其孝闻天下及廉政威名而“幸其第临奠，辍视朝一日，赠吏部尚书，谥孝肃”。

在《包拯家训》影响下，包拯之妻董氏“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其子包绶在赴任潭州通判的路上病故，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浩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后人对此评价说：“益知公生平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公可谓能克家者，孝肃之风，至于公而益炽也”；其孙包永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廉勤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凡厥蒞官临事，廉清不扰”，在死后也“了无遗蓄”，连丧葬费用都是由两位堂弟资助的。后人对此评价道：“孝肃公之遗风余烈犹在也。”包拯的后世子孙大都传承了“孝肃家风”，继承了包拯遗志，他们的墓也多归葬于合肥县公城乡公城里包拯墓旁。

